

9.18

81年前獨家刊《最後消息》

大公報率先報道9.18

毋忘國恥

真實記錄一個世紀風雲跌宕的大公報，在中國近現代史的任何關鍵節點上都不曾缺位失語。1931年9月19日凌晨，大公報以《最後消息》為題，刊登了一則獨家報道——「昨夜十一時許，有某國兵在瀋陽演習夜戰，城內炮聲突起，居民頗不安。」這就是關於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的最早報道。短短數十字的刊發，既有力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恃強凌弱的狼子野心，又為從輿論上引導中國人民頑強拚搏、抵禦外敵，打響了立場堅定的「第一炮」。

本報記者 鄭曼玲

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報記者汪松年從北寧（天津）鐵路局局長高紀毅那裡得到這樣的信息：「瀋陽來電，日軍調動頻繁，景象異常，可能要出事。」於是，汪松年一直守候在鐵路局。時任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指示報社的王芸生、徐鑄成留守編輯部，隨時接聽汪的電話。19日凌晨1時，鐵路局接到瀋陽電話，說日軍在柳條湖開火了。汪松年馬上給編輯部打電話，口述了一條簡短的消息。

此時，大公報要聞版已經截稿，張季鸞立刻決定抽掉一小段，補進這條消息，並為這條消息寫了標題——《最後消息》。於是，讀者在19日的大公報上，讀到了這條《最後消息》：「據交通方面得到報告，昨夜11時許，有某國兵在瀋陽演習夜戰，城內炮聲突起，居民頗不安。鐵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國兵甚多，因此夜半應行通過該處之平古火車，當時為慎重起見，亦未能開行。」

大公報19日刊登的《最後消息》，是當時國內各報對「九·一八」事變的最早報道。由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在18日22時20分，且日軍切斷了通往關內的一切交通線，加之當時通訊條件的限制，所以其他報紙都沒有得到這條消息，均在20日之後才刊發相關報道。但面對同樣的條件，獨有大公報能得到消息，足見記者之敬業與用心。可以說，這是汪松年為大公報搶到的一條獨家新聞，由此他也成為報道「九·一八」事變的第一人。

事變後第一個採訪張學良

19日凌晨，審閱了這則《最後消息》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深感事態嚴峻。他馬上打電話給在北平的總經理胡政之，要他設法採訪正在北平協和醫院療養的張學良。

是日早晨，與張學良已是老相識的胡政之，驅車來到協和醫院。當時，他是「九·一八」事變後第一個見到張學良的記者。到醫院時已經10點，張的侍衛、隨從都已獲悉瀋陽事變，到處都在竊竊私語，氣氛顯得很緊張。侍衛把胡帶到樓上一間非常小的病室中，過了一會，張學良來了，「精神恢復，步履如常，耳聾亦已大愈。」因為當時等待張會見的客人甚多，所以只是在匆忙中接受胡政之的採訪。

張學良說：「君來訪問瀋陽之新聞乎？實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昨晚10時許，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營，開槍相擊，我軍本末武裝，自無抵抗，當被擊斃3人。……」

胡政之又問及「中村事變」真相，張學良回答說，這件事日本指控應負責任的東北軍團長關玉衡已被押在憲兵司令部，並派出大員前往調查，只是在罪情沒有調查清楚之前，當然不能將嫌疑人法辦。這件事交涉正在進行中，也斷無訴諸武力的理由。

第二天（9月20日），大公報要聞版以《本報記者謁張談話》為題發表對張學良的這次採訪，這則胡政之親自採寫的新聞，此後一直被學界視為關於「九·一八事變」的重要史料。

大公報還同時刊載張學良19日發表的通電：「日兵自昨晚10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張的談話和通電主要用意就是要戳穿日本方面誣蔑中國軍隊挑釁的謠言。顯然，年輕的張學良當時還沒有領悟到事變的嚴重性，而日本侵華戰爭的大幕卻以迅猛拉開。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舉國輿論一片嘩然，普遍指責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辛亥革命元老馬君武寫了一首廣為流傳的打油詩《哀瀋陽》——「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哪管東師入瀋陽！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再抱佳人舞幾回。」

很明顯，這是影射「九·一八」當夜，張學良沉湎女色之中，抱着當時的影后胡蝶翩翩起舞。實際上當天夜裡，大病初愈的張學良正在北平中和戲院看梅蘭芳主演的《宇宙鋒》，並沒有跳舞，更遑論抱着胡蝶。

相隔不久，大公報附屬的《國聞周報》編輯馬季廉將



▲大公報創辦人張季鸞（左）、胡政之（右）



日軍進攻路線



馬君武這首打油詩刊登在底頁的補白中。胡政之見到樣本，很不高興，當即批評馬季廉不該發表這首詩。儘管這樣的打油詩或許有些賣點，能增加刊物的銷量，獲得部分大眾的青睐，但胡政之還是通知發行課停止發售這一期刊物。從中不難看出胡政之對張學良的理解與愛護之情，同時也體現出他作為一代報人堅守事實真相的責任感。

制定「明恥教戰」編輯方針

「九·一八」事變後第三天，胡政之、張季鸞召集編輯會議，針對當時局勢，討論編輯方針。會上，張季鸞嚴肅地宣布了兩項決定，一為「明恥」，一為「教戰」。所謂「明恥」，就是盡快開闢專欄，記載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重大事變，幫助讀者了解甲午以來的對日屈辱史，欄目名稱定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並指定王芸生專主其事。而所謂「教戰」，就是在大公報開闢《軍事周刊》，邀請軍事專家蔣百里籌劃，向國人介紹軍事常識。

這一「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在輿論界引起強烈反響，當中尤以「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專欄最為受人關注。當時，王芸生早就對日本步步侵略深惡痛絕，此次能以筆為武器，既感任務之重要又深感榮幸，便毅然接受了這項工作。從1931年10月開始，王芸生奔走於京津之間，往來於故宮博物館和北平各圖書館，廣泛搜集史料，遍查故宮文獻館。在多數未經整理的浩瀚史籍和檔案中，他耐心搜尋，精選摺擇，晚上伏案寫作，有時竟通宵不眠。經過3個多月的緊張工作，王芸生初步整理出頭緒。從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報隆重推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每日登載一段，連續2年半之久，無一日中斷。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恥證明，國難可救！」讀來鏗然有聲。

後來，大公報將「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欄目文章輯錄成書時，總編輯張季鸞為之作序，再度闡明了編輯意圖，「以為救國之道，必須國民全體先負恥責，是則歷史之回顧，當較任何教訓為深切。……欲使讀本報者無今追昔，慨然生救國要雪恥之決心。」

「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發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宣示抗日決心。9月24日，大公報在《國聯發言後遼吉被佔事變》的社評中，對蔣介石的「暫不抵抗，訴諸國聯」的方針提出異議。社評說，「夫養兵百餘萬，而外患之來，專以不抵抗為標榜，世界自有歷史以來，應斷無如此無恥之國民。且不抵抗云云，究以何時為止，限度如何？充不抵抗主義之解釋，凡日軍所到，即我國所失，是最後只有雙手奉送全國而已。」

此後，大公報對日譴責言論升溫，對賣國嘴臉斥責更加嚴厲。

「九一八」事變

資料

「九一八」事變又稱瀋陽事變，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瀋陽，以武力攻擊東北。9月18日，日本製造「柳條湖事件」，發動了對中國東北的戰爭。此次事變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日本國內主戰的日本軍部地位上升，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道路，為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埋下了導火索。中國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佔領，並利用投靠日本的前清廢帝溥儀在東北建立了滿洲國傀儡政權，實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統治，使東北同胞飽受亡國奴的痛苦滋味，因此被中國民眾視為國恥，9月18日在中國許多非正式場合都被稱為「中國國恥日」。



▲大公報1902年在天津創刊

大公報率先報道9.18事變

一九三七年元旦大公報上的抗日畫刊

專訪

本報記者謁張談話

（刊於1931年9月20日大公報）

【北平特訊】本報記者昨晨得瀋陽被日軍佔領消息，隨即驅車至協和醫院，訪問張副司令，時為午前十時。侍衛等人已半知瀋陽事變，竊竊私語，情態頗形緊張，侍衛肅記者登樓，入一極小之病室中。少頃張副司令來，精神恢復，步履如常，耳聾亦已大愈。

時侍見之客甚多，張於匆忙中語記者曰，君來為訪問瀋陽之新聞乎，實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昨晚（即十八晚）十時許，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營，開槍相襲，我軍本末武裝，自無抵抗，當被擊斃三人，先是日方以一車頭載兵將皇姑屯中日鐵路交叉處轟毀，隨即退去，故日方發表謂我軍破毀滿鐵路軌，絕對無有其事。蓋我方避人挑釁之不暇，豈能出此，駐瀋各國領事，俱能明證真相，日兵既入北大營，每間五十分鐘，即由附屬地開砲，直對北大營及兵工廠等

處轟擊，當經我方商之駐瀋日本林總領事請於五分鐘內，速予制止，林氏先請以十分鐘為限，嗣又來電謂已成軍事行動，本人無法制止云云，自是日兵佔領所有交通機關，並本人住宅亦有日兵守衛，惟截至昨上午六時半止，秩序未壞，我方官民，悉不準備抵抗。吾信臧式毅主席必在城內，努力維持，不令秩序破毀，此事自應由政府負責交涉，日本此次，既未下最後通牒，又未宣告開戰，而實際採取軍事行動，令人不解，仍望國民冷靜隱忍，勿生枝節，談話時止，本人所得報告，亦不過十九日上午六時半為止云云。

記者更話以中村事件如何，張答謂此事日本指為應負責任之關玉衡團長已押在憲兵司令部，更派大員如陳興亞司令前往調查，可知我方必盡法處置惟在罪情未明以前，當然未便遽將嫌疑人法辦，且此事交涉正在進行，亦斷無訴之武力之理由也云云，語至此，記者辭出。

此專訪作者 胡政之

千期《戰線》為抗戰「打氣」

【本報訊】《戰線》是《大公報》在武漢和重慶時期一個重要的文學副刊，1937年9月18日創刊於武漢，1943年10月31日在重慶發表「停刊聲明」，共出版996期，歷時6年零1個月。

戰線主編陳紀澄在對作者表達辦刊思想時說，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遭受敵人摧殘之時，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要走出亭子間，以筆為刀槍，寫出富有時代感的文藝作品，鼓勵軍民抗擊侵略者的勇氣和爭取勝利的信心。在《戰線》的創刊號上，陳紀澄寫道：現在我們眼巴巴地瞅着敵人的炮火摧毀我們的文化機關，滅絕我們的文化命脈，我們是不是還躲在亭子間寫些丟開時代，憑着天才

幻想出來的不關痛癢的文藝作品呢？我們是不是還以特殊階級自居而賣弄風雅呢？決不！我們不能逃避這時代，我們不再夢囈、再幻想、再以超人自居，我們無論在前方在後方，都被反抗的戰神主宰了我們的靈魂，我們每個人實際已踏進了戰時的生活境域。

《戰線》的時代感，表現在它所發表的作品全是以抗戰為題材，都在配合為抗戰做「打氣」的工作。揭露日本軍閥的殘暴行徑是《戰線》的另一要務。在抗戰時期，大公報的《戰線》副刊成為中國抗戰全局上的一條重要「戰線」，為動員全民族存亡圖存發揮了重要作用。



▲日本統治時期的東北人民掙扎在飢餓線上。圖為排隊等待施粥的瀋陽貧民

資料圖片



《戰線》是《大公報》在武漢和重慶時期一個重要的文學副刊，共出版996期，歷時6年零1個月

►「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到上海開闢滬版。圖為四十年代的上海大公報館址

資料圖片

